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的力作

——评《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

夏家骏

由于工作的特殊关系，笔者有幸成为《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的最早读者之一。

本书是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我国大陆首部研究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的专著，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郑秦博士的第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力作。全书计分六章三十一节，约十七万字。作者以宏观的历史视野和微观的历史考察，深刻、生动、全面地剖析了清代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与司法制度、多民族统一的法制、刑名幕吏制度与司法审判、刑事审判、秋审制度以及民事审判与调处息讼制度等各个方面，实可谓创造性地而又实事求是地综合分析了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的全部内容。

作者在该书的《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研究司法审判制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了解法律如何规定，而且在于了解法律如何实施；研究清代司法审判制度，不仅要悉知其与前代和古代各朝相因、承接和总结、发展的脉络，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揭示清朝社会的实际情况。这是作者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凝聚。

作者以丰富的资料、透彻的分析、中肯的评价、简洁的文字，原原本本而又选择精当地为读者展示了有清一代司法审判制度的画卷，掩卷沉思，不难发现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作者不仅就清代法制谈清代法制，而且在谈清代法制时概括出了中国整个封建专制制度与法的关系，处处洋溢出烹小治大、高屋建瓴之势，显现了作者雄厚的学术功力。

第二，作者在解剖高度专制的清代皇权与清代法制关系的全过程中，均以辩证法为指导。作者在指出中国封建社会自古以来就不曾有过“司法独立”的情况时，指出了清代皇帝总揽着全国的最高司法权，指出了清帝同样笃信笃行“有治人无治法”的古训，刑部三法司是“奉旨”行事、各省的司法审判亦直接对皇帝负责等等，然而同时又辩证地阐明：清朝皇帝一般都能在祖宗成宪的法定司法程序内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批复死刑、整饬吏治等，因而，“较少任情生杀，设置廷杖、诏狱之类”。作者还指出：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八旗王公贵族和旗人的司法特权制度；但同时又辩证地阐明，清帝大都有很深的汉文化造诣，因而尽力不使上述司法特权破坏整个国家的法制统一，而且，即使在上述那种优待“统治民族”的特权法面前，旗人的各个层次亦非一律适用。

第三，作为全书最显著特点之一的，尤数作者对于有清一代各边疆少数民族区域司法审判制度的全面、具体的阐述。该书不仅详细评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制度的边疆少数民族区域的“基本法”性质的各种单行法规，诸如《理藩院则例》、《蒙古律例》、《西藏通制》、《回疆则例》等，而且恰切指出了：各少数民族区域实行着“变通过的、不同的司法审判

制度”，只是重大刑事案件才须报中央审批，而西藏却有自己的终审权。清代法制的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原则，实为清代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巩固的重要手段之一。

第四，作者把握住了中国刑事审判的发展脉络和历代多数帝王“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体系，敏锐地抓住了清代创立的秋审制度进行分析，深刻地指出：这一制度，使死刑的审理与复核，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严格的法律程序之中，一方面保证了皇帝为首的国家专制权力对死刑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收到了镇压和恤刑的双重效果，限制了地方官员的擅杀、滥杀，在较为广阔的社会范围内提供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社会氛围。

第五，该书饶有兴味地记叙了清朝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衙门的刑名幕、吏在司法审判中的活动，具体考察了清代社会的司法审判的实践。作者还精辟地指出：许多刑名幕、吏，具有着官员疏略的律、例和案牍的专门知识，在控制减弱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代官出治”，因而使强化到极点的专制权力的势头往往得到减弱。幕宾们的这种作用，历来未引起国内外的清史研究者的严重注意。

第六，作者从整个清朝统治集团注重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巩固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维护社会安定的角度出发，通过大量史料，经过科学的审视，得出了清朝统治者尤其是地方官对于民事案件审判的基本原则是责惩与调解相结合，而又以调处为主，并且还十分注重发挥宗族、乡邻在调处息讼中的作用的结论，这也完全符合中国历代统治者“以教弼德”的传统事实。

总之，恰如著名法学家张晋藩教授所指出：该书在清代皇权于法制的关系、清代的司法审级管辖、刑名夫子的作用，秋审制度和民事调处等方面，实在是“开拓了清代法制史的新领域”，“都是读清史常常遇到，但至今尚缺乏或根本没有深入研究的”；于古代司法审判制度，可谓一个全面的总结，于今天的司法审判制度的演变，也不无“历史借鉴”的意义。

不过，也许由于篇幅的限制，作者对于清代司法审判的某些具体过程的举例，还略嫌不足。

尽管如此，《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到底是大陆第一部关于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的极有价值的专著，是一部还有助于深入研究整个清代全部历史的极为重要的著作，颇有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

（上接第51页）

及活动方式，揭开了蒙在这个组织身上的神秘色彩。当然，从浩如烟海的清代历史资料中收集、整理、鉴别这些零散但又庞杂的史料，是相当艰苦的。天地会组织又历时百余年，遍布江南各省与海外，即使是对它们的活动作一个较为详细的统计，也是一项不胜繁杂的工作。在这个问题上，作者能不畏荆棘，不辞艰辛，锲而不舍地追求，并最终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在这里，体现了作者的务实态度和严谨的作风，同时，也显示出作者丰富的积累和较为深厚的史学功底。作者平时在这方面花费的艰苦努力则更是显而易见的了。

当然，本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有关天地会起源研究的评述似乎字数过多，给人有些冲淡主题之感。不过瑕不掩瑜，本书开全面系统研究清前期天地会之先河，为人们继续深入研究作出了贡献。